



圣府的圣人信仰

闫长丽

—

孔子的神化、圣化是历代统治者推崇的结果。自汉代以后，孔子的圣人形象在历代封建朝廷的不断加封中日益强化。晚清各帝虽因内忧外患未亲临圣庙，但仍派朝廷重员致祭孔子，且不断在孔庙中新增大量的儒学名宿配祀。至民国时期，尊孔之势丝毫未减。袁世凯于民国元年（1912年）即颁尊孔令，著孔子第76代嫡孙孔令贻仍袭衍圣公并加郡王衔；民国3年（1914年）制定《崇圣典例》恢复孔府祀田制度。蒋介石时期尊孔祭孔一如既往，在废止“衍圣公”封号的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不得已于1935年1月18日改封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而且蒋介石在抗战避难之时仍不忘携奉祀官同行，并在陪都重庆歌乐山特意为他修建了“猗兰别墅”作为“奉祀官府”。

历代统治者尊崇孔子、优渥其后裔，孔氏家族对于恩荫后世的先祖更是

不断神化、推崇。早在元代孔元措所作《孔氏祖庭广记》中，就将孔子描绘为异于常人的神圣：“先圣身长九尺六寸，腰大十围，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隼，坐如龙踞，立如凤峙，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耳垂、珠庭，龟脊、龙形、虎掌，胼胝、参膺，河目、海口，山脐、林发、翼臂、蚪唇、注颜、隆鼻，阜腴、堤眉、地足、谷窍，雷声、泽腹、昌颜、均颐、辅喉、骈齿，眉有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其头似尧，其颡似舜，其颈类皋陶，其肩类子产。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清代、民国时期对于孔子的神化推崇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国后期，虽各地的反孔思潮此起彼伏，但孔氏族人对于孔子信仰仍矢志不移。他们不仅维持着严格而繁琐的祭祀仪式，而且把对孔子的信仰推广至与之相关的众多事物上，如对孔子诞生地尼山的详加保护；在曲阜只允许祭拜孔子的文庙存在，他教一概不准设立；保护孔府的圣脉、风脉，等等。



祭孔典礼

收割。“尼山各界山草”需经“秋间委员查验明白，方许分割”。至于林木树株，更是不得砍伐、樵采。咸丰十年（1860年），孔府曾发布保护尼山树株的告示，以严禁盗伐林株。甚至尼山租户的耕牛不意上山践踏，也要其主人“栽柏树五十株，赎不小心之罪”。

二

尼山位于曲阜县东南六十里，周围十里，跨曲阜、邹城之境。本名尼邱山，因避圣讳去一字。尼山是“圣林地脉之攸关，亦合邑风水之所系”。此地严禁樵采牧猎，虽一石一草亦不得损害破坏。尼山四周立有界石作封禁标志，南至昌平亭，北至冷饭堂，西至普陀山（后改封到五花顶），东至小山。巡山户按分工区域看护。清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六月，尼山南麓鲁源庄刘尚绮因开垦尼山界封内的荒地，与孔府巡山户发生争执，以刘尚绮被押收场。至道光年间，因所禁日渐松弛，在尼山圣庙附近擅开石塘灰窑者“较前更甚”，致使“数年来，圣贤后裔凌替衰微，合邑人士奄忽不振，揆厥由来，实缘于此”。于是衍圣公府下令“封禁石塘，永不准其再开”，以便“地脉凝聚融结，而官绅士民自然振兴有日矣”。尼山之石成为孔氏家族兴旺之根基。尼山的柴草，亦不得随意

光绪年间，随着孔府的每况愈下，无暇顾及尼山的护卫，佃户不但在尼山“放牧羊只，恃强率众”，而且还有意毁坏尼山孔庙：“大殿内至圣先师位向东南歪斜，复圣、述圣神位均倾倒在地。殿内正面，香炉、烛台摔落地下，香几歪倒。东哲供桌翻倒，香炉摔毁一脚，烛台落地，牲匣翻倒，地盘损坏一个，并有摔毁灯罩一个。”（骆承烈等：《孔府档案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尼山随着圣人家的衰落亦不再是圣山。

三

曲阜为圣贤桑梓之地，禁设他教，以示独立尊崇。清代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衍圣公孔毓圻曾上书，请山东巡抚王国昌、布政使刘皓“咨毁三教堂”、“除三教之名”，以正人心。同年，孔子第67代嫡孙孔毓埏因“请除邑僧道印记不果”，入都见礼部尚书韩菼、通政使吴涵，指责礼部“给僧纲录印记，源不清流”，使得三教无以遏制。韩菼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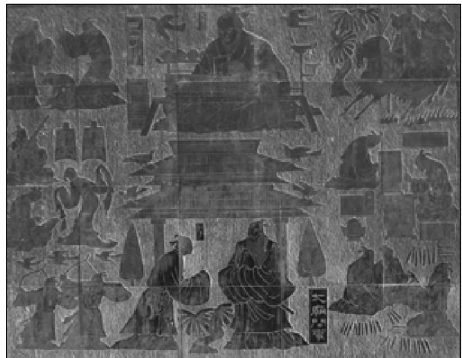
“愕然”，但准其行此事。孔毓埏归乡里后，告于兖州知府李世敬，自请清除三教之职，“誓为圣人廓清此片土”，然不幸未几因疾而终。对于在本土绵延已久的释、道两教，圣贤故里均一体排斥，不留任何发展余地；至于外来教派，在曲阜更无立足之地。

清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国教会派神甫至曲阜传教，并打算设教堂，最后选中了景色优美的曲阜城东南隅的古泮池，拟动工兴建耶稣教堂。孔氏族闻之莫不震惊，衍圣公孔令贻闻讯后更是恼怒不已。他一方面会同曲阜知县孙国桢上书朝廷，表明曲阜是儒教发源地，不宜外人传教；另一方面联合曲阜的绅商名流，集资在古泮池北岸建筑文昌祠，以抵制教堂的兴建。最终耶稣教堂未能建成，圣贤独尊的地位在形式上得以保存。但曲阜的民众甚至孔府的佃户已开始接受外来的宗教，不再是儒教忠实的守卫者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信奉天主教的孔府佃户武玉林、刘伯河将孔府祀田及自家宅基地卖与德国教堂，衍圣公孔令贻得知后随即请“兖州天主教堂副主教德华盛，将约作废，并将教民武玉林、刘伯河分别革除教籍”。

宣统二年（1910年），曲阜姚家庄村民刘伯安将宅基地卖与德国教堂，曲阜知县刘晋庚将其关押追回草约，并函复兖州天主教堂韩主教：“查曲阜为敝国圣贤故里，从前各国教堂亦有在此置买宅地，意欲建堂传教，均经各前县及衍圣公善言辞谢。均蒙各教堂将原约退还，历有成案，同尊孔教，兼笃邦交，敝



孔林前的林道与万古长春坊



孔庙诗礼堂画像石“太庙问事”



孔庙大成殿供奉的孔子像



衍圣公孔尚贤墓



衍圣公孔宪培之妻于氏墓



于氏墓坊局部

县何胜感佩。此次姚家庄民刘伯安假卖宅基，事同一律。此敝县所以将刘伯安关押，追还草约也。曲阜不立教堂，虽无约条，然既为圣人故里，非奉国家特许，敝县不敢擅允民人将宅地卖与各国教堂。”民国年间，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曲阜不立教堂的规矩不复存在。民国23年（1934年），孔昭曾所编《续修曲阜县志》在曲阜宗教一目中明确地记载：“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德国在西关中间建筑天主教堂一处。”圣贤故里已不完全是儒教的天下。

四

圣府的道路千百年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许有任何变动，以防破坏圣脉。当近代文明的曙光靠近时，孔府仍在顽强地捍卫自己微弱的渐渐消失的圣脉。光绪三十年，德国胶济铁路公司欲在曲阜修建铁路，事先测路之时，在孔府祭田栽木插标，距“圣林西墙仅五十丈”。林庙百户张东敏发现后立即禀告孔府：“至圣庙祭田黄米租地被洋人栽木插旗，欲修铁路，从东北斜着来到坊上村。此村周围皆是祭田地亩。在村东头黄米地中，斜着栽到村南，直顶泗河埃，忽而转向西北，又从黄米地中斜着过去等情，到卑职，以祭田地亩关系重大，未便擅专，理合备文申详，伏乞爵宪大人鉴核施行。”

衍圣公孔令贻得知后便“亲赴省城面商东抚，委员会县勘丈禀覆，咨会津浦铁路大臣，特饬设法迁移”，迫使德国胶济铁路公司不得不改变原定路线，使得铁路线“距圣林在十里之外，不至震

动圣墓”。而衍圣公孔令贻因保护圣墓有功，被赏穿膝貂褂。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宋还吾曾言：“前津浦铁路开修时，原议以曲阜城为车站，衍圣公府迷信风水，力加反对，遂改道离城十八里外之姚村，致使商贾行旅，均感不便。驯至曲阜县城内社会，仍保持中古状态，未能开化。”认为铁路未修，交通不便致使曲阜处于“半开化之境”，“不能吸收近代之文明”，从而固守旧的封建传统冥顽不化。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孔府竭尽全力所护卫的圣脉并未为之带来福兆，而是无可阻挡的衰落。

五

孔子后世子孙并未遵照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祖训，对于已故去的孔氏族人，孔府每年都要花费大量开支用于祭奠。

过阴寿是孔氏家族对已故衍圣公及夫人或孔氏家族德高望重长辈的祭奠活动，其仪式如同为生者寿庆，以表达后人的缅怀之情。孔府的寿堂一般设在忠恕堂，厅正中挂死者影像，四周挂满孔氏本家所送的锦缎寿幛，祝寿的族人皆献酒磕头拜寿。

孔府祭奠已故族人最虔诚的莫过于对慕恩堂中供奉的衍圣公孔宪培夫妇的祭拜。慕恩堂是清代嘉庆年间孔子第73代嫡孙、衍圣公孔庆镕为报答乾隆、嘉庆皇帝及继父孔宪培、继母于氏之恩而修建的（孔宪培、于氏夫妻无子，过继侄儿孔庆镕为子）慕恩堂明三间，东西各一间里间，共有工作人员5人，其职责是于年节和“忌辰”之日，摆设供品

齐备后，禀报衍圣公，而后衍圣公及夫人来祭拜祠堂。清代嘉庆时期，每日专有两位女仆为孔宪培夫妇伺候三餐茶饭，床上被褥晨叠夜铺，可谓事死如事生。光绪六年（1880年），司房支销食用杂项账中记有祭奠慕恩堂的开支：“慕恩台供檀香一两，京香二封，红本表八张，小叶四两，大米三斤。”到清代末年和民国时期，由于孔府经济衰败，只是在年节和“忌辰”时祭祀。1945年7月孔府内家庙祠堂的供菜酒席账中记载只是在七月初一、初七及十五日供奉“慕恩堂六味供一桌”。

孔府之所以对孔宪培夫妇如此虔诚祭拜，是因为于氏是乾隆之女，她下嫁到孔府，显示了孔府的荣耀。

《论语·为政》篇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府是“圣人之门”为礼教之宗。孔府的丧葬礼制，遵照孔孟之道，体现“追终慎远”的祖训，但“孔颜丧事，不作佛事”，孔府有其独特的送葬仪式。送殡之时，需有点主官“点主”和辞土官“辞土”的仪式。点主仪式比较简单，即是在死去之人牌位上点一点，以示显灵。辞土官的任务相对比较复杂。在送殡队伍到达墓地前，辞土官先带着全副武装的奉卫丁，到墓地和“鬼怪”们“打仗”，将其全部“消灭”以便灵柩安静地下葬。如果辞土官被打败，就会招致很多灾难，故担任辞土官的人不仅要地位显赫，而且需能征善战。因为其职务的危险性及重要性，主家皆会对其优礼相待、重金酬谢。衍圣公孔令贻下葬时，担任辞土官的是兖州镇守使。按照孔氏族规，十二府办丧事

都应有辞土官，但民国时期因经济困顿，只有孔府在送殡之时用辞土官。

六

孔府作为维系了两千余年的贵族世家，一切皆按照祖宗留下的规矩行事，排斥异于祖训的事物，这延缓了孔府前进的步伐。孔府虽有许多皇宫御赐的精美珍贵的钟表，但仍执著地沿袭着最古老的计时方法。大堂放置着铜壶滴漏计时，日常起居以晨钟暮鼓为准。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新式的生活用具渐被应用于日常生活中，暖水瓶在相对闭塞的曲阜已不鲜见，但孔府仍继续到中间烧木炭、四周是水的自制茶炉上去打开水。至20世纪30年代，远嫁北京的孔德齐带回一只暖水瓶，阖府五六百人视之为珍宝，将其收藏而轻易不用。

孔府日常生活严格遵循“有例不可减，无例不可添”的原则，凡是祖传的规矩，不许做丝毫的改动。孔府西学的忠恕堂室内摆设一百多件，历经几百年仍原封不动地放置着，任何一件东西都不

能随便移动其位置，更不能添置新的用具入内。春节之时，每年初一孔府内所有仆人因给衍圣公及夫人拜年而获赏一“红包”，红包自清代开始即为二两银子，直至全国解放前仍按二两银子的折价发给仆人。平时日常生活中，衍圣公及其夫人经常外出或在府内陪客人吃饭，但其例饭例菜却不能打破，照常按时上菜上饭，丝毫未动的整桌饭菜由伺候宴席的仆人用盆罐带回自己家里。这形成一种定制，美其名曰“上折下”。孔府人员编制中过去曾有轿夫一职，轿子取消后，轿夫只得改行，但人员编制中仍留轿夫之称，直至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结婚时，孔府已拥有了自己的汽车司机，名存实亡的轿夫只是一名勤杂人员，但其名称在孔府人员表格中仍继续存留。孔府的仆人依据祖制各司其职，不得违反。例如侍卫孔府大堂的仆人不准进二堂，侍卫二堂的不准进三堂。即使侍奉衍圣公夫人和小姐们的女仆亦各有专职：梳头女仆专管梳头，伺茶女仆专管伺茶，洗衣女仆专管洗衣，等等。而且孔府仆人



孔宅内景



孔宅故井

必须严格遵守儒家的生活规范。作为礼仪之家，孔府非常注重衣着的穿戴整齐，所谓“当暑 衿绮绌，必表而出之”。孔府家规指令仆人必须着装整齐，即使夏天也不许穿短裤短褂。1945年夏天，内宅门水夫王景玉因着短裤短褂挑水入内宅门，被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发现，立即将其开除，可见家规之严。

七

综上所述，孔府对于孔子的信仰，可谓至尊至敬，竭力做到尽善尽美；对于孔氏家族所遗留的族规祖训，尽行恪守，即使日常生活中琐碎的细节，亦丝毫不得逾越。孔府的人物信仰是孔氏家族捍卫儒家思想至尊地位的体现，表现了孔府崇儒重道的文化本质。自五四运动以来，儒家正统地位不断受到外来新文化冲击，儒家思想构成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观念逐渐动摇，激进的知识分子把矛头指向了儒家的代言人——孔子，但是孔氏家族对于孔子的信仰与尊崇并未因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一如既往地展示了其对先祖敬仰的诚心及决心，期望社会再度重视其作为“天下第一家”的神圣地位。

时至今日，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成仍居住在台湾，在台湾大学已从教50余年。作为中文系、人类学系的兼任教授，他以台湾大学的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自勉；身为孔门传人，他始终致力于弘扬儒家文化，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2006年元旦，孔德成和孙琪芳（晚清状元孙家鼐之孙女）伉俪业已四世同堂，其曾孙、即孔子80代嫡孙孔佑



孔府门前的下马石



孔府花园一景

仁诞生，按照历史惯例，孔佑仁仍将被封为“奉祀官”。从1998年起，世界上最长的《孔子世家谱》开始第五次续修。至2008年，来自台湾的900多名孔子后裔首次被录入世家谱，而且该家谱还首次续入女性、少数民族和外籍后裔，包括八万多韩国的孔子后裔及美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国的孔子后裔。孔子的圣脉在世界各地延续。

（题图：孔庙里的古树）